

收稿日期:2022-08-26

权力及其解构: 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中的权力空间

冯雨欣, 俾 康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擅长用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她的获奖小说《给樱桃以性别》采用独特的时空叙事方式,构建了大量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幽闭所、刑场是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表征着权力对个体的约束和支配;言语之城、爱疫之城是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体现了话语集权对个体的影响和规训;构建异托邦是温特森的挑战性空间实践,以空中之城、领域外之地颠覆现实规则,解构现实社会权力。研究温特森作品中的权力空间,可以揭露西方权力体系及话语体系的真相。

关键词:珍妮特·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权力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2-007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珍妮特·温特森的解构主义故事观及其文化语境研究”(18BWW053)。

作者简介:冯雨欣(1998—),女,内蒙古包头人,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批评研究;俾康(1980—),女,江苏扬州人,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批评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2.025

珍妮特·温特森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由于突出的文学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又因同性恋身份及作品后现代叙事方式,她也被誉为“英国当代最好也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1]。

《给樱桃以性别》是温特森的第三部作品,1989年出版后不久就获得了E.M.福斯特奖。《纽约时报》评价这部小说“将历史、童话故事和元小说融合进了一种水果里”^[2]。温特森热衷于构造各式各样的空间,以空间作为典型的意象呈现其对权力的思考。在《给樱桃以性别》中,温特森构建的各类空间就有20余个,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一、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

温特森在小说中构建了许多具有典型特征的权力空间,用来表征权力对个体的支配和约束。空间具有生产性,能生产出权力关系,同时权力关系以空间为自身运作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是直接经历(lived space)的空间,这是一种被支配、被体验

的空间。”^{[8]39}温特森将文本中具体的空间编码为与权力相关联的表征性空间,使权力关系被纳入建筑物等空间,让权力在空间中恣意展示其直接而残暴的统治手段,于是,空间成为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

(一)幽闭所:限制自由的空间

温特森构建的幽闭所是文本中构建的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禁锢之塔、公主卧室都体现了权力对个体的控制。

温特森将禁锢之塔定义为“死亡之塔”^{[4]47},那里囚禁着因禁忌之爱败坏伦理道德的年轻女孩。塔处于被孤立的空位位置,“无所依傍……海岸线上一片荒凉,没有人烟……这儿什么都没有”^{[4]46}。身体的自由是“人的权利和财产”^{[5]11},但塔内的女孩完全失去自由。禁锢之塔具有幽闭所的特质,世俗权力监视、控制塔内个体的身体,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体权利。

主人公约旦被“鸟”带到了禁锢之塔。鸟是在空间中位于高处的生物,和权力一样都“来自高处”^{[6]209}。温特森以此暗示塔中的女孩受到“高处”权力的监视。不仅禁锢之塔这个建筑空间本身表征着权力,塔外空间与塔内空间还构成了双重的监视空间。塔外的村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与塔中的年轻女孩形成一种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而他们凝视禁锢之塔时,也建造了一座“塔”囚禁自己的内心。世俗权力定义了他们各自的行为,塔内女孩的行为被视作“非理性的”和“疯癫的”,而塔外的村民们则是“理性的”。义愤具有儆戒的力量,村民们的义愤使塔外空间中的世俗权力拥有牢固的统治基础。村民们将女孩视作败坏道德的罪恶主体,认为这种罪恶具有传染性,甚至“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7]65}。将女孩禁锢于塔中,是世俗权力努力切断罪恶丑闻的传播链条、严防社会秩序被扰乱、巩固其统治的手段。

一方面,禁锢之塔将女孩的“非理性”行为隐匿起来;另一方面,禁锢之塔又把“理性”人群的注意力公开地引向所谓的“疯癫”,并“集中于疯癫”^{[7]64-68},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疯癫。疯癫是一种权力的话语建构,用于控制空间及空间中的个体,是一种压迫机制。权力将中性的空间转化为惩罚的空间,使空间表征着权力。权力是双向的,塔在禁锢女孩自由的同时,也在禁锢监视者的行为。当塔外村民知道约旦来自塔中时,他们的反应是跪倒在地、胸口画十字等,行为变得疯癫。村民们认同权力的压迫行为,并将世俗权力制定的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于是,他们由行使世俗权力的主体转变为同样受世俗权力控制的对象。当村民的注意力集中于塔中女孩的“疯癫”时,疯癫的凝视行为将囚禁的空间由塔内转到塔外。

类似空间在文本中还有一处。温特森改写了十二个跳舞公主的故事,她这样介绍国王为公主们安排的生活空间:“十二个公主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那间房比新辟的河流还要窄,但比先知的胡子还要长。”^{[4]68}父权对公主们的生活实施了全方位的监视和控制,狭长的空间使公主们的行动一览无余。逼仄、狭窄的私密空间表征着公主们在父权主导的空间中只拥有微乎其微的自由,即使对卧室这样的私密空间也没有主导权。

温特森构建的幽闭所式空间,是世俗权力和父系权力表演的场所,也是女性个体受到权力监视和控制的表征性空间。温特森通过书写权力操控下的女性命运,揭示了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

(二)刑场:权力更迭的演绎场

温特森经常借人物之口言及空间,甚至“使人物明确地谈论空间的性质”^{[8]8}。在《给樱桃以性别》中,温特森透过普通底层民众狗妇之眼观察描述着权力在空间中的表征性。温特森将“刑场”置于十七世纪处于宗教混乱中的伦敦城,“那些清教徒想要圣人统治,只要耶稣,不要国

王”^{[4]99}。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国王势力与清教徒势力斗争的产物,两股势力在战争中两次交锋,第一次交锋以国王被处死为结束,清教徒获胜;第二次交锋的结果则是清教徒领袖们被国王的拥趸处死,这宣告了清教徒丧失统治权,查理二世复辟成功。

刑场是处罚行刑的场所,温特森在文本中构建了两个刑场空间。第一个刑场空间,呈半开放结构,“行刑台在火光重重中被建造成型,刽子手站在墙上的火炬下”^{[4]104},刽子手的身后有墙体作为依靠,墙上的火炬为刑场增威造势。刽子手需要有空间中的实物作为支撑,暗示清教徒势力掌权的内在空虚性。断头台是刑场空间的公共表演区域,国王的身体是权力表演的道具,生命变成了权力的对象:“片刻之后,他的头被包裹在一块白布里,身体被抬走了。”^{[4]104}国王的统治被推翻,清教徒们用公开处决国王的仪式建立起他们的权威,以此威慑警示潜在的异教徒。第二个刑场空间则是完全开放的,在空间中国王势力无需支撑或依傍,由此可见查理二世行使权力时的肆无忌惮。“成千上万的人涌来观看三人(清教徒领袖)残留的在风中飘荡的尸骸”^{[4]162},普通民众是“看”的主体,当普通民众观看国王或清教徒领袖的生命权被践踏的同时,他们也在被权力所注视,即“凝视的前存在(the preexistence of a gaze)”^[9],普通民众始终处于权力的凝视之下。“一些人甚至在白骨下摆起了摊子”^{[4]162},温特森以此暗示普通民众在权力的控制下变得麻木,甚至利用权力更迭的时机谋取自身的利益。“参与处决查理一世的九人被吊死……挖出肚肠,肢体四分。”^{[4]164}通过对清教徒领袖等反叛势力的处决,查理二世颠覆了清教徒的统治,重新建立起国王权威。公开处决成为查理二世“重建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5]51},普通民众观看血腥暴力的权力表演并在心中形成对权力的敬畏,君权宣扬暴力统治并向普通民众告知权力的更迭。

在分析温特森所构建的处于权力监视下的生存空间时,林少晶强调,“身体是最小的空间单位,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何种权力也就意味着对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拥有多少话语权”^[10]。清教徒审判员宣告国王将被斩首,国王无法掌握自身生与死的基本权力,其生存空间就被清教徒势力完全掌控。清教徒领袖的身体成为被剥去了意义和人性的“动物性的身体”^[11]。这种原始的“动物性身体”被查理二世毫无顾忌地当作战利品,是对清教徒个体权利彻底的剥夺。

温特森构建的两个刑场,是君权与宗教权力激烈碰撞的表征性空间,是权力更迭的演绎场。在刑场中,这两种权力为了排除异己、树立权威都采取了血腥的手段:通过对生命的扼杀和对身体的惩罚向公众展示权力,并以此威慑群众、巩固权力。

二、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

除了故事中禁锢之塔、刑场等实体空间,温特森还构建了符号性的空间。温特森构建的符号性空间是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触及人们的身体及精神领域。列斐伏尔提出:“空间表象(conceptualized space)是被概念化的空间……倾向于一种语言(因此是作为知识而创造出来的)符号的体系。”^{[12]59}“空间表象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施行的‘秩序’捆绑在一起,与符号、代码等关系相关联”^{[12]51},与认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相结合,因而空间表象是拥有权力的强势群体所构想的空间秩序。遍布于空间的权力已然扩展到了个体意识与思考的领域,“扩展到了隐匿在主体性的褶皱下的‘特殊空间’里”^[13]。

(一)言语之城:话语权力的实体化

温特森高度重视个体发声的权利,但在现实世界中,强势群体掌握了话语权力。言语之城是温特森构建的抽象的空间表象,隐喻话语权力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温特森将话语权力的残酷性,化为言语之城中词句能动的施为性,反映话语权力对个体的影响。

言语之城的词句构成世界,具有重量。词句作为话语权力的意象构成言语之城。人们对生

活重负的不满,形成“厚厚的言语之云”^{[4]15}。温特森使话语具象化、实体化,解构了“重/轻”的对立:最重的话语转化为质量最轻的云,而质量最轻的云却拥有空间中最大的体量;地面铺满碎石,狭窄拥挤,反倒成了空间中不重要的部分。这暗示话语集权下人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被忽视。空间表象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约旦在心中经常回到这里,意味着他经常感受到话语权力对自己施加的压力。空间是权力运行的场所,在言语之城,词句的重量即世界的重量。约旦想要“逃避世界的重量”^{[4]15},暗示着他想要逃脱话语权力全天候全方位的掌控。

言语之城的词句具有施为性,能对人施加影响。人们相互叫喊的声音在空中形成“言语之云”^{[4]15},气势汹汹地侵占人们的生活空间,是当代话语权力侵占个体生存空间的映射。词句作为施为者镇压着人类的反抗,人们甚至需要与之酣战来清理城市的上空:“还在凶狠争吵的词语会抓伤人,愤怒的云朵袭击清理工的气球,铅顶下恋人的激情言语挤走了空气,令人窒息。”^{[4]15-17}凶猛的词句构建残酷的现实,词句的施为性隐喻了话语权力的残酷性,即话语能够形成权力甚至杀伤人。词句不仅有了生命,在城市里与人一起生活、共同存在,而且成为施为者,词句也即话语权力控制着个体,个体被“咬伤”乃至“窒息”都是词句施为的后果、话语权力残酷性的证明。

言语之城揭示了现代人对强大的话语权力避无可避的事实。温特森给词句赋予生命,使其直接作用于个体,强调了话语权力对个体的影响。

(二)爱疫之城:权力的规训

爱疫之城,是一个话语高度集权的空间。这座城市禁止爱的种种行为,强化了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规定了空间秩序,使权力对个体的压迫得以实现。这座城市的居民在经历了三次爱的瘟疫侵袭之后,几乎全部灭亡了,僧侣和妓女是仅有的幸存者,成为了空间重建后的统治者。“在重建的国度里,爱应是非法的。”^{[4]112}作为统治者,僧侣和妓女将重建后的空间定义为“国度”,由此确定了重建空间的性质。空间表象被认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所充满,国家是需要规则的空间,统治者将他们对爱的恐惧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相结合,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居民,对整个空间的秩序作出规定,让这个空间的所有居民小心地隔绝爱。

权力策略都有一个空间维度,“权力也有与其相应的空间统治实践”^{[6]33}。知识规训便是爱疫之城中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用的手段。僧侣和妓女统治下的城市,居民们被禁止爱别人,也不允许被爱,他们接受的是“禁爱教育”。“孩子从小被教导‘爱’会带来可怕后果”^{[4]112},城市禁止微笑、禁止吉他和曼陀林。权力制造知识,同时,权力也对知识进行管理。爱的博物馆是权力对知识进行管控的重要抓手,也是“知识转化为实际权力的关键空间”^[14]。博物馆作为安置文物典籍的陈列馆,是实体化知识的集中存放地。这座爱的博物馆晦暗而庞大,象征着在僧侣和妓女统治下的城市暗淡且无趣。被爱人出卖的参孙的塑像被放置在主厅,醒目地警示人们爱的危险;吉他和曼陀林是“色欲与暴怒的乐器”^{[4]116};玫瑰、毛绒狗等被当作爱的禁品。博物馆作为特殊的建筑空间,原本承担着记录和传播知识的责任,而权力将爱的博物馆改造为“知识禁令”的展览场地。统治者即创造知识的人,他们将所有有关爱的知识和细节都汇编成书,分门别类地列出来,如微笑被放在“S”条目下,注释是“微笑,最早的示爱征兆之一”^{[4]115}。规训悄无声息地进入人们的行为规范,权力为民众划定了活动的范围,从而达到控制个体的统治目的。创造知识的人将知识传递作为权力施展身手的渠道,通过控制知识内容的传授,与接受知识的人之间形成权力关系。由此,知识不仅是“强大统治力对个人的投射”,更是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15],使得统治权力能够发挥其功能。

爱疫之城是温特森构建出来的空间表象。在爱疫之城中,强势群体借助知识、禁令和法律等规训手段实现其统治,使居民们为象征符号所控制,接受强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爱疫之城体现

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控制,他们制定了空间秩序,书写了权力规训的空间表象。爱疫之城反映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他们被迫接受强势群体的话语规训,并将强势群体制定的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三、构建异托邦:挑战性的空间实践

温特森将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写进故事里,她解构性的故事观“发出了对现代主义的真实观念、话语方式、逻各斯中心理念的质疑,‘是对概念化生活的挑战’”^[16]。根据列斐伏尔提出的“三位一体”^{[12]60}的空间理论,空间实践主要是指把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要素和阶段投射到一个空间的场域。在现实中,有些个体内化了空间表象,其空间实践顺从空间表象,是为“顺应性的空间实践”^[17];而有些个体意识到社会空间秩序的虚构性以及社会的构建性,他们采取不同的空间实践策略挑战既定的空间秩序,即“挑战性的空间实践”^[17]。温特森的空间实践是挑战性的,她积极地寻找一个不受权力控制的空间。温特森以构建异托邦为空间实践策略,打破权力的表征性空间及空间表象的制约,从而完成对权力的解构。

(一)空中之城:对现实规则的颠覆

福柯在《不同的空间》中为“异托邦”(heterotopias,又译为“异位”)做了定义和分类:“‘幻觉性异托邦’公然排斥所有真实的空间和人类在其中的真实位所,即否定真实空间的秩序,‘补偿性异托邦’创造了一个与真实空间不同,但同样完善、严密的空间,这种异托邦反映了人们对完美世界的愿望和理想。”^{[18]26-27}温特森在《给樱桃以性别》中所构建的空中之城是幻觉性异托邦和补偿性异托邦的结合。

空中之城否定了现实空间中的规则,温特森通过颠覆规则突破现实权力的桎梏。首先,温特森否定了“下”的必要性,“房子没有地板,下面只有无底深渊”^{[4]19-20}。房子内部的一切都是悬空的,人们依靠绳索在内部移动。其次,她一反常识,抛弃了屋顶,房屋内部不断上升且没有尽头。再次,温特森构建的空中之城是一个没有重力的空间。城市是漂浮的,居民们悬空生活,从空中跌落的女孩反而会飘浮起来。“抛弃地心引力的人也会被地心引力抛弃”^{[4]149},整个空间甚至漂浮出了地球。“下”“房顶”“重力”都是现实空间的规则,温特森以重力隐喻权力掌控下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温特森将“重”颠倒为“轻”,在小说中“把等级秩序颠倒过来”^[19],解构权力在现实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温特森所构建的幻觉性异托邦是否定现实权力的空间。

空中之城排斥现实世界的父系权力。温特森将十二个跳舞公主的故事纳入自己的叙事逻辑。十二个公主被空中之城的巨大力量所吸引,加入了这座没有重力与规则的城市。空中之城仅对受国王监视、控制的公主们有影响,而且只有当国王沉睡时,公主们才能摆脱重力,温特森借此暗示父系权力强大无比。“我父亲宣布任何一个找到我们晚上行径的人都可以娶走我们中的一个”^{[4]152},“他们锁住了我们的脚踝,为了控制我们”^{[4]153}。父亲将公主们的婚姻、人身自由作为父系权力的筹码和附庸,对女性个体的控制手段已昭然若揭。原本童话世界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空间表征,而温特森构建的空中之城是公主们逃离父权控制的异托邦,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公主们的身体摆脱了重力,心灵挣脱了桎梏,空中之城是公主们理想中的完美世界,也是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补偿性的异托邦。

(二)领域外之地:对现实社会权力的解构

福柯认为,异托邦和异时相关联,异时堆积的异托邦打破了线性时间。“异托邦在处于某种与传统时间绝对的断裂时才开始完全起作用。”^{[18]25}温特森在《给樱桃以性别》中依据的是“异于

传统时空观念或者说人类时空经验的时空观”^[20],小说建立起悖论式的时空叙事话语,“时空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时空的有序性和无序性是其遵循的叙事原则”^[20]。而处于时空不确定性和时空无序性原则下的领域外之地便是温特森构建的另一异托邦。

领域外之地是远离现实权力的异托邦,温特森笔下的伦敦是符合时空确定性和有序性的社会空间,内战持续了八年,清教徒和国王的权力之争让社会变得混乱。“伦敦……到处都是瘟疫和腐败。”^{[4]8}泰晤士河也变成散发着恶臭、盛满垃圾和污泥的水域,自然空间的污浊暗示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安。约旦随园艺师特拉德斯坎特出海航行,航行所经过的海洋空间是远离污浊现实的领域外之地。“海洋之中,灰色的水面上不断翻卷起白色的浪花……太阳从水面上升起。”^{[4]13}海洋空间与受权力斗争影响的伦敦形成对比,“太阳升起”代表希望和光亮,温特森暗指在远离权力斗争的异托邦才能看到希望。“海峡和运河将我引向开阔的大海时,我便意识到心灵的世界是多么浩瀚无边。”^{[4]158}宽广的海洋开阔了人的胸襟,净化了人的心灵。福柯认为:“水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液体,属于自然中最纯洁的事物。……在清澈的冷水中,人就会恢复其最初的纯洁性。”^{[7]157}作为领域外之地的海洋空间,排除了现实世界的污浊,成为远离现实权力的异托邦。

领域外之地是反抗现实权力的异托邦,温特森借领域外之地中主人公对权力近乎偏执和疯狂的反抗,表达她对现实权力的不满。《给樱桃以性别》第三部分的标题为“数年之后”^{[4]171},是二十世纪的女科学家与十七世纪的狗妇、二十世纪的尼古拉斯·约旦和十七世纪约旦超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替叙事。异时使异托邦敞开大门,二十世纪的女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住了一个高大粗壮的巨人,正是十七世纪狗妇的形象,温特森更是将二十世纪的尼古拉斯·约旦以“幻觉和心病”^{[4]123}的名义置于线性时间之外的“时间 1”的片段中,与十七世纪的约翰·特拉德斯坎特面对面,设置了跨越时空的形象交互和对应,因此,二十世纪的空间便是领域外之地。

温特森笔下的人物多数是变革的象征,“他们占据或寻找与他们的思想相协调的空间”^{[8]13}。女科学家作为“高学历的化学家和男人乐于共事、有魅力的女性”^{[4]194},本可以从事轻松体面的工作,跻身上层社会。她却住在河边的小屋,亲近自然,远离传统的居住空间,远离人群,孤身一人抗议污染、抗议寡头对污染的放任、抗议民众对污染的漠视。她偏离了当权者所定义的“理性”,不追求高薪、高地位、舒适的生活,却苦苦追寻着自己心中的“理性”,努力阻止水银污染河流、环境被破坏。报纸是权力控制的舆论机器,它将女科学家的形象描述为“疯癫的”,表明个体一旦违反了当权者所制定的规则,就会受到舆论机器无情的诋毁和抨击。女科学家对权力的反抗,是十七世纪狗妇反抗清教徒权力的映射。她在想象中拥有狗妇的能力,闯进世界银行、五角大楼,试图从源头终结污染和腐败。狗妇和女科学家拥有坚定的信念并为之奋斗,在断裂时空的交错处,她们达成了意向上的一致。女科学家和尼古拉斯·约旦放火烧了污染环境的工厂,狗妇和约旦烧了污浊的伦敦城,领域外之地是她们反抗现实权力的异托邦。

领域外之地是找寻自我的异托邦,是温特森构建的抵抗性的、个性化的空间。约旦在污秽的伦敦里失去了自我,内心一片荒芜。他在空中之城偶遇的舞者成为了他剩余旅途追寻的目标。“我是在寻找一位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舞者,还是在寻找那一部分舞动着的自己?”^{[4]51}舞者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形象,更是约旦正在找寻的舞动的自我。舞者福尔图纳达所处的孤岛,是约旦心灵之旅中的异托邦,那里“时间没有意义,空间和地点也没有意义”^{[4]121}。温特森认为岛屿是心的隐喻,福尔图纳达在这个孤岛空间处于支配地位,为自己而舞,意味着她可以掌控自己的心,即找寻到了自我,不再受外在权力的控制。列斐伏尔认为光与“真理、生命和既定的权威相一致”^{[12]53}。福尔图纳达教授她的学生们如何成为一个“光点”,可以解读为福尔图纳达在教授她的学生们如何成为自己的权威。在文本中,温特森曾 6 次提到“光点”,并且以“真空与光点”^{[4]226}作为小说的结尾,契合其争取个体权利的主张,表明最坚固的物质也可以被认为是“真空”,既定物质空间所

表征的权力关系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光点”是温特森希望每个个体建立起来的自我权威。约旦的心灵旅途以“隐形地图”^[21]为导向,福尔图纳达是这地图上的中心坐标,以“为自己舞动”的福尔图纳达为心灵的坐标,约旦意识到心灵富足便可拥有整个世界,“仅仅一天的时间,心灵便可造出五湖四海”^{[4]121}。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尾写道“天亮的日子还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个晓星”,暗示人们可以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希望,而“只有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才能达到诗意生活的精神生态”^[22]。

《给樱桃以性别》构建的表征性空间是权力表演的演绎场,权力在幽闭所、刑场中对个体实施的控制、惩罚,隐喻着当代西方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约束和控制。言语之城、爱疫之城是权力规训的空间表象,映射着当代西方社会中当权者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媒体对弱势群体乃至所有社会群体进行言语、行为规训。温特森以挑战性的空间实践颠覆社会规则,构建异托邦,解构现实空间权力。

温特森以改变读者的生活为创作的责任,希望她的作品可以启发读者拥有“看到自己”^[1]的新视角。温特森的作品体现了她对权力失衡的思考,反映了她对个体特别是女性个体能否掌握自己命运的关切。温特森主张公认的真理也可以被讨论,她在文本中重构故事,解构社会默认的规则,构建出不受权力约束的“替代空间”。她希望读者避免陷入权力构造的谎言陷阱,不为谎言所操纵,她巧妙地将官方话语比作现成的食物,方便快捷,然而,为了保持健康,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个自己的三明治”^{[8]14},即建立自我权威。在个体失语、弱者失语的现状下,她鼓励个体为自己发声,争取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研究温特森作品中的权力空间,有利于揭露和解构西方的权力体系及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温特森,拜尔格,蒲火. 写作就是高空走钢丝:珍妮特·温特森访谈[J]. 延河,2016(5):84-103.
- [2] GORRA M. Gender games in restoration London[N]. New York Times,1990-04-29(7).
- [3]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1991.
- [4] 温特森. 给樱桃以性别[M]. 邹鹏,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 [5]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5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6] 克莱普顿,埃尔顿. 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与地理学[M]. 莫伟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7] 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杨远婴,译. 5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8] SONMEZ M, OZYURT KILIC M. Winterson narrating time and space[M].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9.
- [9] 吴琼. 他者的凝视:拉康的“凝视”理论[J]. 文艺研究,2010(4):33-42.
- [10] 林少晶. 温特森的真实空间:权力下的生存空间[J]. 当代外国文学,2015,36(3):106-112.
- [11]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4.
- [12]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3] 索杰. 第三空间: 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9.
- [14] 袁超. 城市空间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44.
- [15] 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49.
- [16] 佺康. 论珍妮特·温特森小说作品中的解构主义故事观[J]. 外国文学,2015(6):67-74.
- [17] 王桃花,罗海燕. 温特森《正常就好,何必快乐》的空间解读[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6):49-55.
- [18] 福柯,哈贝马斯. 激进的美学锋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9] 卡勒.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25周年版)[M]. 陆扬,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7.

- [20] 阳利, 骆文琳. 论《给樱桃以性别》中的时空叙事话语与主题叙事[J]. 当代外国文学, 2014, 35(3): 98 - 109.
- [21] 佺康. 珍妮特·温特森的故事本体论研究[J]. 中国文学研究, 2021(3): 33 - 39.
- [22] 杨伶俐. 从“自然”到“生态”: 试析梭罗作品中的生态隐喻[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1): 112 - 118.

Power and Its Deconstruction: The Power Space in *Sexing the Cherry* by Jeanette Winterson

FENG Yu-xin, NAI K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6, China)

Abstract: The award-winning novel *Sexing the Cherry* is written by Jeanette Winterson, a famous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who uses unique spatiotemporal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construct a large number of metaphorical spaces. The confinement facility and the torture chamber are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of power performance, which represent the restraint and domination of power over individuals. The city of discourse and the city of love plague are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centralized discourse, representing the influence and discipline of centralized power over individuals. Winterson constructs heterotopia as a challenge to experiment with the space, so as to break the rules of reality and deconstruct the social power through the silvery city and place outside the realm. The study of the power space in her works is of significance to our exposing of the Western power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Jeanette Winterson; *Sexing the Cherry*; power space

〔责任编辑:何敏敏〕